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斯大林



Stalin

[英]伊恩·格雷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斯大林

[英]伊恩·格雷著 达 凯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前 言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879年,斯大林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城,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工人罢工活动,1899年成为职业革命家,1903年被选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从1901年3月到1917年二月革命,先后被捕七次、流放六次,从流放地逃出五次,始终没有间断过反对沙皇制度。1912年春,斯大林创办《真理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1917年7-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坚持了列宁的武装起义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1922年4月,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2月,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国内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并且领导取得了与党内左、右倾斗争的胜利。

1929年,苏联举国上下庆祝斯大林50寿辰,一些党政领导人不惜歪曲事实颂扬斯大林的功绩,使得苏联国内个人崇拜之风,越来越盛行。1938年,经斯大林亲自审定,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个人崇拜从历史上和理论上完全确定下来。1936年到1939年间,苏联进行了大清洗运动,大批无辜的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都遭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

1941年5月-1953年3月,斯大林先后担任国家军、政重要领导职务,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探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大问题。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在莫斯科逝世。

本书详实地介绍了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及许多鲜为人知的私人故事。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使您对斯大林有深刻地了解,而且会使您对苏联国家的兴衰成败有具体的认知。

译 者

目 录

序 幕	俄国的传统	1
第一章	童 年	6
第二章	格鲁吉亚学生	9
第三章	神学院学生	11
第四章	革命者柯巴	17
第五章	巴统——坐牢，流放	23
第六章	柯巴，布尔什维克党人	27
第七章	革命的序曲	32
第八章	革命在退却	36
第九章	高加索时期结束	43
第十章	斯大林崭露头角	49
第十一章	最后一次流放	55
第十二章	一九一七年	60
第十三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69
第十四章	内 战	76
第十五章	新纪元的开始	97
第十六章	列宁暮年	108
第十七章	列宁去世前的几个月	117
第十八章	列宁的遗嘱	130
第十九章	反对派的覆灭	137
第二十章	领袖的形成	153
第二十一章	新领袖	161
第二十二章	新革命	170
第二十三章	恐 怖	183
第二十四章	战争的前奏	203
第二十五章	战争：灾难深重的岁月	223
第二十六章	俄国的反攻	244
第二十七章	德黑兰会议	258
第二十八章	挺进德国	268
第二十九章	波茨坦的背叛和大同盟的终结	292
第三十章	大复兴	304
第三十一章	逝 世	318

序 幕 俄国的传统

斯大林统治的许多与西方概念迥然不同的特点，根本在于许多世纪以来俄国人的历史和观念。这是俄国传统的一部分，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并出于与其先辈同样的原因维护了这一传统。

这一传统中最重要的部分部分是：国家至高无上；君主是国家的化身，对国内所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和思想享有绝对权力；自尊心易受伤害；层层保密，疑虑重重，对西方人更是如此；优越感，以救世主自居；对外界的批评敏感；以残暴手段行使权力。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到过俄国的西方游客和分析过斯大林统治的俄国的人们，都指出了这些相同的特点。他们认为俄国历史有连续性，甚至是沿袭不变的。

俄国的历史，是一部为平定辽阔的欧亚大平原而进行无休止斗争的历史。酷暑短暂而严冬漫长的极端气候，没有天然防御屏障的广阔的平原，纵横交错的大河——俄国就是在这些自然条件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但它是一个受围困的国家，地理位置处于欧亚交界地带，夹在定居的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不断受到外界的侵扰。

在西方国家，人们追逐的是财富及政治和经济权利。历代俄国人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抵御外来入侵，保家卫国。入侵和战争决定了他们的观念和政治制度。就象接受君主的绝对权力一样，他们完全听命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族的存在需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一个能够鼓舞每一个人和其它资源进行防御的统治者。

基辅罗斯——这是迈向国家的第一步——存在了大约三个半世纪。但它不能抵挡亚洲的贝琴涅戈人、库曼人等游牧民族的劫掠，不能抵挡日耳曼部落的压力。日耳曼人把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赶到了他们的北面。为了谋求安定，俄罗斯人移居加利西亚和白俄罗斯，但大部分人迁移到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游，那里是森林地区。在那里，莫斯科变成新俄罗斯国的中心。而后，蒙古人在十三世纪入侵。

成吉思汗率领的骑兵横扫欧亚平原，所向披靡，势不可当。在以后两个世纪中，蒙古人的残暴统治给俄国人和新兴的俄国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可汗专权独断。作为蒙古帝国军法和民法的《雅撒》规定对大部分犯法的人处以死刑。不纳税，或不提供定额兵丁，特别是揭竿造反，立即会受到酷刑。俄罗斯人和其他臣民必须顺从。

斯大林

十五世纪，当时莫斯科的大公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但他们同时面临着建立新俄罗斯国的艰巨任务，包括保卫国土，收复由东正教俄罗斯人居住但依然处于外国统治下的土地，以及继续向南边和东边开拓大片殖民地。俄国经常受到喀山汗国（直到1552年沙皇伊凡四世才把它征服）以及西方的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日耳曼人的侵略骚扰。

但是，在此期间，与克里米亚汗国的鞑靼人（他们的后台是其宗主国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频繁发生战争，使这个年青的俄国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鞑靼人在频繁的、有时是逐年进行的侵扰中，从大草原疾驰而至，掠夺和破坏，但主要目的是把俘虏拿到地中海市场当奴隶出卖。俄国定期派兵驻守边防，有些防区在莫斯科以南不到一百英里处。慢慢地，他们沿这条南部边界建立了哨所和城堡，并向南推进。

与鞑靼人的斗争，在俄国历史上持续了近三百年。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只要你想到在这场激烈的、疲惫的驱赶鞑靼入侵者的斗争中所花费的漫长岁月以及物质和精神力量，恐怕就不会提出当西欧在工商业、社会生活、艺术和科学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的时候，东欧的人民在干什么一样的问题。”

克里米亚汗国终于被征服，1783年并入俄罗斯帝国。长期存在俄国历史的侵略和战争变得比较断断续续了。但是十九世纪初，拿破仑侵入俄国。在鲍罗季诺进行了一场激战，之后法国人占领了莫斯科，莫斯科的一部分被大火烧毁。

几乎所有的俄国人对他们历史上发生的每次战争悲剧一直存于记忆中。很难说是否还有哪个别的国家曾经受到如此频繁的洗劫。痛苦而又漫长的经历使人们产生一种易受伤害的心理和家园受到威胁的意识。对于长期处于安定环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确实难以理解这样一部历史所承受的军事压力、无穷的苦难和悲剧。

一位十七世纪的游客阿达姆·奥利斯易斯曾经说过：“世界上再也不能找到什么人比莫斯科人更尊敬他们的大公了，他们从孩提起就听到大人教他们尊崇沙皇，就象尊崇上帝一样。”

沙皇笼罩在拜占廷式的庄重的气氛之中。他不仅仅是崇拜的偶像，还被赋予蒙古可汗那样的绝对权力。他的子民就是应当俯首听命的奴隶。在拜占廷和灌输凯撒专制天主教教义的东正教的影响下，以前蒙古的遗风有增无减，虽然某些方面被改头换面。沙皇不仅是一国之主，也是东正教的首领，是上帝在凡间的代表。在动乱时期（1605—1613），鲁里基德王朝

覆灭，波兰人入侵俄国，侵占了莫斯科，俄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对沙皇的天赐权力的信仰动摇了。但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同一种信仰又很快得到恢复。对沙皇的崇敬、屈从和绝对顺从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17年革命，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传统就是后来把列宁神化以及斯大林大权独揽和搞个人崇拜的根源。

在历史上，沙皇的主要职能是动员人力物力开展国家防御工作。民众按军事要求组织起来，保证有足够的军队戍守南疆并抵抗西边的敌人。俄国疆土广阔，而向东和向南开拓殖民地，便意味着人口的疏减。一种人人都完全处于君主束缚下的体制慢慢形成。其基础是实际上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论功行赏，把土地赐给达官显贵。这样一来，农民又成为达官的奴隶，包括达官显贵在内的所有臣民则都是沙皇的奴隶。十七世纪，农奴制演变成一种奴役制，近似奴隶制。

在一个如此土地广阔而人员稀少的国家，为了征兵征税，采用了学自蒙古人的野蛮办法。处死以及能够致死的鞭挞即笞刑等酷刑乃是处处可见。沙皇所有的臣民都要受相同的处置。直到十八世纪末，贵族和教士才免于鞭挞。到十九世纪，在西伯利亚流放和服苦役成了正常的处罚。

沙皇的特别警察，开始于1565年沙皇伊凡四世的禁卫兵，然后发展成沙皇自立法庭的警卫队和第三厅，他们几乎处处都在。在整个历史上，俄国人对沙皇一向卑躬屈膝，接受以他的名义给予的处分。推行强权的手段使百姓受苦受难，但没有人起来反抗。的确，俄国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他们的国家和政府，认为比其他国家优越。这种看法使西方游客感到惊讶，他们对人民大众忍受的奴役、暴虐和穷困惊讶不已。

早在十九世纪初，俄国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写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吸收了外国风俗的许多优点，但是从未失去过这样的信念，即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是完美的公民；神圣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这可能是一种幻觉。然而，它对增进爱国主义精神和国民道德品质的作用是多大啊。”卡拉姆津本人并没有把这种优越感当作是幻觉，广大的俄国人民也不这样认为。

当年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俄国人一直和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关系。然后，在将近二百五十年（1240—1480）的时间里，他们处于蒙古可汗的压制之下，与世隔绝。他们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探险、科学发明等西方的变化没有感知。到十六和十七世纪，沙皇深切地感到俄国的落后，特别在战争艺术方面。到俄国来的英国商人受到沙皇伊凡四世的欢

斯大林

迎，因为他想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彼得大帝（1682—1725）在他整个执政时期为使俄国摆脱落后和孤立的局面坚持奋斗，他最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海军和陆军技术。不过，他认识到，俄国安全不能单靠军事力量，还必须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西方文化进入俄国，民众感到不安。他们以极大的忧虑看待来自西方的一切。他们对国外的情况一无所知，当局也不允许他们出国游历。替沙皇做事的西方专家只准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外国人公寓”，免得他们接近信奉东正教的国民。保守思想根深蒂固的俄国人坚持已见，认为他们比西方人优越。

东正教加强了他们的这种信念。大约在十世纪末，俄国人通过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新的信仰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使他们的观念发生了强烈的变化。蒙古可汗对基督教采取了容忍态度，因此在他们占领期间，俄国的教会发展得很快。它对俄国的创建起了重大作用。虽然它承认君士坦丁堡是正统基督教的中心，但是也已经入乡随俗了。

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异教徒土耳其人手中。已独立的俄国教会赢得了继承的地位。他们把莫斯科说成是第三个罗马，莫斯科变成了俄国人的信仰目标。这一传奇提高了君主的权威地位以及莫斯科的名望。它也表达了俄国人的要求。他们的教会是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唯一保卫者。他们要领导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实现团结、博爱和获得拯救。

到二十世纪，这种救世主义再也不能用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这样的话来表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信条，俄国人试着以此来主宰西方和世界各国人民。

俄国人在对外宣称掌握了真正的信条的同时，仍然认为自己负有领导和保护西方文明的使命。他们一直以来就宣称，俄国保护了西方，使他们免遭成吉思蒙古骑兵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摧残。

直到今天，这种使命感仍象过去那么强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拯救了西方。根据苏联的说法，俄国人参与战争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且是为了使欧洲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主义，使世界免遭法西斯主义的残暴压迫”。类似的说教突出地表现出要领导和改造世界的救世主义的意识，而从十五世纪以来这种意识就深深地烙在俄国人的脑海里。

叶卡捷琳娜女皇曾经说：“俄国是个欧洲国家。”她同时又强调，俄国历来是个欧洲国家。这个提法在十九世纪常常引起争论，直到今天依然争

论不休。事实是，俄国在社会价值观念和传统方面一向与西方有明显的区别。在俄国访问的人看到奴役、暴虐、守口如瓶、疑虑重重、以救世主自居等生活现象无不惊讶无比。他们通常还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有时表现出一副傲慢的自满的神气，而乔治·凯南等等二十世纪的作家则对俄国的许多作法表示了一种高尚的道义上的不满。

俄国人一向害怕批评，不愿被人怜悯。斯大林确实埋怨过大战期间在俄国北部工作的英国海军军官对俄国海军的高人一等的态度。西方人那种觉得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态度进一步加强加深了俄国人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保密、甚至敌对。而且，正如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说，俄国人觉察到，西方人根本不理解俄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以及阻碍俄国发展的其它因素。西方的态度实际上进一步助长了俄国人的思想，即自认为具有特殊的力量和使命的意识。

俄国人在对西方的态度方面还是有分歧的。以彼得大帝为代表的、以彼得堡为象征的主张西方化的一派人力图抛弃大部分保守的俄国传统，改变俄国，完全加入西方国家大家庭。斯拉夫派，有时也称旧俄国派，拥有俄国的广大群众，喜欢旧有传统，坚信俄国人在力量和道义方面历来比别人高。他们主张与西方的联系越少越好，坚信俄国靠自己的办法可以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的霸主。这些观点之间的矛盾在莫斯科与彼得堡之间的对抗中不断显现出来。

斯大林选择了俄国作为自己的国家，吸取了旧俄国派的观念和传统，以及他们对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发展的信念。

第一章 童年

(1879—1888)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在历史上称约瑟夫·斯大林），1879年12月9日（公历21日）生于格鲁吉亚古老的城镇哥里。哥里坐落在水流湍急的库拉河畔，被群山包围着，地处第比利斯省一个风景秀丽山区的中心。山谷里的葡萄园、麦田和果园远近驰名。哥里是古希腊人所说的科尔吉斯州的一部分，根据希腊神话传说，忒萨利亚王子伊阿宋曾带领亚尔古英雄们来这里寻找金羊毛。约瑟夫在这种田园般的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他的父亲维萨里昂是距离第比利斯不远的迪迪—利洛村人，维萨里昂的双亲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都是农奴。对维萨里昂来说，解放意味着他可以做鞋匠生意。1870年前后，他迁到哥里，1874年与邻村一家农奴的女儿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结了婚。她大约十八岁，比丈夫小五岁左右。他们是下层人民，家境贫寒，都不识字。他们在哥里大教堂附近教堂街的一所小屋里安了家。有一道门廊，两间房子，地板是用砖铺的，还有一间地下室。主室差不多有十五平方英尺，只有一个窗户，光线比较暗。屋里摆着一张小桌子，四张凳子，放着一把茶炊的一个小碗橱，一面镜子，一只存放衣物的箱子，还有一张铺着草垫子的木板床。台阶通地下室，是叶卡捷琳娜生火做饭的地方。以当时俄国的标准，这是个确实确实的贫困之家的陈设。

就在这间房子里，叶卡捷琳娜生了三个孩子，都夭折了。第四个孩子就是约瑟夫，她把她的爱 and 心血全部倾注在索索或索塞罗（约瑟夫的爱称）身上。

人们对维萨里昂的情况了解不多。看来他难以靠修鞋谋生，1885年，他回到第比利斯，在一个名叫阿杰尔哈诺夫的亚美尼亚人开的一家制鞋厂找到工作，他婚前就曾在这个厂里打过一段工。

斯大林在公开场合仅有一次提到过他的父亲，他指出，作为一个鞋匠，他的父亲不是个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仍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他在另一次公开场面还提到过他的童年和他的父母。那是在1931年12月接见著名的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时候。路德维希问道：“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大概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斯大林答道：“不是的。我的

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然而他们待我很好。”这个说法与有关他的童年的其它记载有出入。

约瑟夫小时候的一个朋友约瑟夫·伊雷马什维利说维萨里昂体格高大，眉毛黑黑的，胡须浓密，脾气暴躁。据说他是个酒豪。格鲁吉亚人以能喝酒而有名。在格鲁吉亚，在俄罗斯，“醉如鞋匠”是人们的口头禅。

后来，伊雷马什维利以一个流亡者的悔悟和偏见知道：“无缘无故和可怕的毒打使这个男孩象他父亲一样冷酷无情。”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她父亲告诉过她，为了保护他母亲，“他有一天将一把刀子向父亲扔了过去。父亲大声喊叫着追他，邻居把他藏了起来。”

在斯大林童年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他的母亲叶卡捷琳娜。他母亲年青时显然是个漂亮的红头发女人。同丈夫一样，只会说格鲁吉亚语，但在晚年时，她学会识字，起码学会了用俄文写自己的姓名，以配得上她的儿子。他是她生活的核心人物。由于丈夫把挣的钱都买酒喝了，没有足够的钱养活一家，“她不得不整天整夜拚死拚活地干，刚好养家糊口”。在维萨里昂到第比利斯去以后，日子好过了一些，因为她只要照料自己和约瑟夫就行了。她洗衣服，烤面包，收拾屋子，缝制衣服。她使他不缺吃，不缺穿。因此他体格强健，有非凡的精力。

叶卡捷琳娜是个忠诚的教徒，也正是出于社会原因，她决定让约瑟夫当教士。农奴的解放为有特殊本领的农民的孩子敞开了神学院的大门。按规矩，当了教士，他可以结婚，主管一个教区；他可以在世上步步擢升，在替上帝效力的同时，他可以享受她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安逸生活。她为儿子一心想的就是这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不知死活地干活。

哥里有四所学校，包括一所初级神学校。叶卡捷琳娜让自己的儿子进了那所神学校就读。此时，他只能说格鲁吉亚语，她安排他学习俄语，这是必须得学会的语言。她还为他取得了每月三个卢布的助学金。同时她在学校当洗衣妇和清洁工还可以挣十个卢布。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她与约瑟夫生活了五年。

有两件事情使她的计划几乎破灭。1886年，约瑟夫患了天花，病得死去活来。他那结实的体格使他熬过来了，与此同时他的脸上也永远留下了很深的麻子。另一件事是她丈夫的反对，他一定要让孩子学父亲的手艺。“你想让我的儿子当神父，作教堂官，是吗？”他问道，“你一辈子也别想！不错，我是个鞋匠，我儿子将来和我一样也将是个鞋匠。”

大约在1889年，有一天，维萨里昂回到哥里，把他的儿子带到第比

斯大林

利斯的阿杰尔哈诺夫的工厂。这件事在家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妻子和邻居坚决劝阻他不要这么做，可他顽固坚持，偏是要儿子到制鞋厂学手艺。在约瑟夫前途问题上爆发的斗争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但还是叶卡捷琳娜的话最后算数，因为约瑟夫又回到哥里上学去了。

斯大林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插曲，他对他父亲的情况闭口不谈，可能是因为他恨透了这个打骂过他和他母亲并因发酒疯使他们感到没面子的人。1890年，他父亲在一次酒后争吵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他那时只有十一岁，但是他的经历留下的阴影都是痛苦的回忆。

他一直很爱他的母亲。她是个很有原则性的女人，有严格的观念，很固执。她很严厉，有时也打他，但毫无疑问她也是娇惯他的。他小时候很亲近她，知道她生活艰苦，后来还变得非常孤独：她溺爱的儿子十五岁离开家到第比利斯。在以后的五年里，他每次回家看她的时间都不很长。此后他实际上已离开了她的生活。她虽然经常收到他的信，然而他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他变成了与格鲁吉亚相距很远、与她的朴素的生活环境相距更远的俄国的伟大领袖和统治者。

叶卡捷琳娜一直是个虔诚的妇女，没有什么别的爱好，生活简朴。虽然她没受过教育，斯大林称她是“精明能干的妇女”。他也佩服她的正直的品格。想到她生活孤独，他曾劝她搬到莫斯科住。她在克里姆林宫里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然而变化太大了。她回到格鲁吉亚又一次过起恬静温暖而又熟悉的生活。

1932年照的一张像片展示出一位身着黑色格鲁吉亚服装的老太太的脸面。嘴唇坚实灵敏，然而目光沮丧茫然。两年以后，当她的孙儿孙女去探望她时，他们看到她在第比利斯老式房宅的一间小屋里半坐在一张很窄的铁床上。她也有更好住处的选择，但她还是选择了这个地方。孙儿孙女很少与她来往，因为他们之间只有一人懂得格鲁吉亚语。他们来看望她显然使她很受感动，由于在看望她时，大部分时间她的眼睛里一直噙着眼泪。

她从不知道儿子的崇高职位，也从不知道他四周的人在搞阿谀奉承。在她逝世前不久他去看望她时，她对他说：“你没当上神父，真遗憾！”这是她一生深感可惜的事。斯大林活着时经常以赞同的口吻说起这番话，称赞“她瞧不起他所取得的成就，鄙视那种大轰大嗡的场面，瞧不起人世间的荣华”。他自己也很少想到身居高位享受荣华富贵，他与母亲一样，生活也简朴无华。1936年，她去世了，终年差不多八十岁。

第二章 格鲁吉亚学生

(1888—1894)

约瑟夫在哥里神学校读了五年。他母亲自然吩咐他要用功学习，可是他天性争强好胜；他一定要拔尖，胜过别人。他天赋很好，有非凡的记忆力。他考试的分数总是很高，是“优等生”。1894年7月，他离开学校，获得一张考试优等证书，当时他才十四岁。校方保送他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神父们当然知道他是贫寒家出身，他的父亲因喝醉酒闹事致死，所以这一保送意味着对他的能力和前途的信任。

伊雷马什维利描述约瑟夫当时的样子是：瘦而结实，鹰钩鼻子，窄脸有麻子，眼睛乌黑，活泼好动，他身材尽管小，然而强壮有力，是学校最棒的摔跤手。然而他与“其他孩子不同”，由于乖戾嚣张而不讨人喜欢。不少有才干的人身材并不高，家境贫寒，出身卑微，生理上有缺陷；他与这些人一样，好斗，爱出风头。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在青少年时，任何人只要服从他专横的意志，就能和他友好相处。”

约瑟夫在哥里上学时，又得了一场重病。这次是败血症，左臂感染。几年以后他对他的姨子安娜·阿利卢耶娃谈到这场病时说：“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挽救了我的命：不只是我的结实的身體，还是一个村医的药膏。”病愈后，他的左臂略微短了点，肌肉有些萎缩。托洛茨基说，后来，他左手总戴着一只厚手套，假设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是这样。这又一个缺陷无疑使他更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所以必须得表现出众。

在学校里，约瑟夫刻苦地读书。据伊雷马什维利说，他读完了哥里图书馆“差不多所有藏书”。叶麦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说道，约瑟夫这时阅读了马克思和达尔文的书，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每当有同学提到上帝时，约瑟夫就打断他的话说：“你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没有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看一看；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瞎说的。”倘若确有此事，那差不多也是在这以后发生的，由于他在神学院上学时才肯定失去了信仰。当时在第比利斯，除了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以外，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有人说，约瑟夫有方法从镇上一家私人书店搞到诸如此类的图书。

他在神学院刚上了两年，教学方面发生了巨大改革。格鲁吉亚语过去一直是讲课用的语言，然而在1890年，亚历山大三世大力提倡俄罗斯化，

斯大林

措施之一就是规定教课一律用俄语，因而格鲁吉亚语正式成了一门外语，一个星期只教两节课。

约瑟夫的同学瓦诺·凯茨霍维利写道：“在哥里学校高年级，我们开始接触格鲁吉亚文学，然而却没有教师指导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给我们的思想以明确的引导。恰夫恰瓦泽写的诗《大盗卡科》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卡兹别吉笔下的好汉们在我们年青的心灵里唤起了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大家从学校毕业时都殷切地想为国效力。但谁也说不清应该怎样为国效力。”

他们对祖国和祖国文学的热爱是显然的，由于格鲁吉亚历史上流传了传奇故事，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约瑟夫被格鲁吉亚传奇英雄们迷住了。他读了肖泰·卢斯达维里的《披着豹皮的骑士》，但是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卡兹别吉写的绿林好汉柯巴（无情的人）的故事。他首先用柯巴作绰号；后来，这个绰号变成了他常常使用的名字，直到1910年前后，他开始管自己叫柯巴·斯大林，最后才改为约瑟夫·斯大林。

高加索地峡位于外族侵略的一条古道上。西徐亚人，西梅里人，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波斯人，最后还有俄罗斯人，过去都占领过这块土地。与外高加索的另一个基督教国亚美尼亚一样，格鲁吉亚受俄国的统治。格鲁吉亚人把沙皇看成是使他们不受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侵扰的天然保护人，把莫斯科看作是东正教的中心。并且，格鲁吉亚的贵族绅士多如牛毛、穷困潦倒。很多人向往圣彼得堡富丽堂皇的宫殿，并想在俄罗斯官场捞个一官半职，所以一有机会就纷纷北上。

在这几个世纪里，尽管历次的征服者造成破坏，尽管数不胜数的战争使许多人没了生命，虽然土耳其人、波斯人和其他人贪婪地要求得到更多的高加索奴隶，尽管很多人迁居北方，但是，格鲁吉亚人从他们的古老文化里吸取了力量，总算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来了。

格鲁吉亚人一般身躯颀长，肤色深暗，头发漆黑。据说他们秉性粗犷豪放，反复没有规律，脾气暴躁，慷慨豁达，殷勤好客，爱说话。这个豪放的民族出了不少诗人、演说家和酒豪。

概括民族特点虽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但可以包括实质成分。但是，约瑟夫除了某些身体特征外，却完全不象格鲁吉亚人。在他生涯的初期，他于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俄罗斯人，他轻视格鲁吉亚人，也许是由于他们喜欢享乐，热情奔放，富于幻想，这种人易于脱离实际。

第三章 神学院学生

(1894—1899)

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府，位于格鲁吉亚西部地带，气候炎热干燥，风沙弥漫。第比利斯是座古城，有宽敞的广场和大街，从广场和大街延伸开去，是窄小的曲曲弯弯的街道，两边排满的平顶房和集市。在集市上，土耳其和波斯商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摩肩擦背，讨价还价。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比利斯的人口有十五万多，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第比利斯是沙皇派来的总督的首府，外高加索（包括格鲁吉亚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部分地区）政府驻地，人们操着各种民族口音，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俄国政府看到外高加索作为边境地区的重要性，修筑了一条军用公路，以加强防御。然而这个地区开始具有新的经济意义。石油和采矿业在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帮助下很快发展起来。1867年，首先铺设一条从第比利斯到黑海的铁路线，这条线路很快又从第比利斯延伸到里海的巴库。

对年仅十五岁的约瑟夫来说，从哥里搬到这个热闹的城市，肯定感到是个巨大的变化。过去，他一直住在家里，得到母亲的关心；如今，他孤身一人生活在生疏的环境里。叶卡捷琳娜也觉得孤单，但她引以自豪的是，他的儿子进了第比利斯神学院。这个学院在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人的心目中有特别高的威望，被看成是他们的最高学府。

第比利斯神学院与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的神学院一样，其办学目的不仅在于进行教育，而且在于训练学生过宗教生活。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一股骚动的热浪传遍欧洲。在俄国，神学院闹得非常凶。

约瑟夫被录取时，第比利斯神学院已经变成一个反对俄国当局的中心。1885年，一个名叫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的学生（后来的一名革命领袖）因为袭击了曾说过格鲁吉亚语是“狗语”的院长丘杰茨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二年，丘杰茨基被另一个学生刺杀了。1890年3月，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罢课。1893年末，米哈伊尔·茨哈卡亚和拉多·凯茨霍维利（两人后来都成为积极的革命家）组织了另一次学生罢课。警察关闭了学院，八十七名学生被除名。

1930年公布的第比利斯警方档案表明，早在1873年，就有人报告学生阅读禁书，里面提到了达尔文、巴克尔、米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

斯大林

作品。搜查学院时发现了几本勒南的《耶稣的一生》和雨果的《小拿破仑》。三名教师因有“自由主义精神”而被解聘。然而，警方档案着重指出，学生骚动的真正源由，与其说是自由派的或革命的思想，倒不如说是强烈的民族主义。

约瑟夫入学时，神学院院长是个俄国修道士，名字叫格尔莫格尼斯，学监阿巴希泽是格鲁吉亚人，一心想得到俄国当局的提升。想到丘杰茨基被暗杀，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害怕学生的造反精神。他们对学生管教很严，天天盯着学生，探听学生的行动，经常检查宿舍。

伊雷马什维利写道：“我们被关押在营房墙内，活象囚徒，无辜地被迫长期受监禁。”学院里的生活照例每天都很严。早晨7点全体学生一块到礼拜堂里做长时间的东正教祈祷。白天，上课和祈祷交差进行。学生只有得到特殊许可才可以在课后外出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点校门关闭以前返校。校纪严格。犯了小错误的学生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单独禁闭。修道士的迫害。饭食质量差，没有新鲜空气和运动，使不少学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在神学院的头两年，约瑟夫留给老师的印象显然是个用功听话的学生。第一年，他在全班排名第八，第二年排名第五。他脑子反应很快，记忆力强，能够一下子记住所学的神学课。他从来没有丧失他对祷文以及新旧圣约全书的韵律和诗意的兴趣。另外，课程还有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以及俄罗斯文学和历史。尽管形式拘泥，范围狭窄，总还算是良好的基础教育。

与此同时，他也学习造反者的谋略。他开始憎恨学院和修道士，憎恨他后来所称的“屈辱人的制度”。他很快接受当时在学生中间风行一时的造反精神。然而修道士没有看出他的真实感情，直到后来他再也不想掩饰时，他们才有所察觉。

同时入学的伊雷马什维利显然对约瑟夫有几分敬畏。他与同学保持着距离，也不招人喜欢。他在哥里神学校上学时就有一种非要争第一不可的劲儿，如今变得越发令人生畏了。在神学院严格的环境里，他发现自己是有力量的，于是进行自我修炼。

在这期间，约瑟夫读书的范围更广了。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他就从这个图书馆借过书。他读的作品不仅有格鲁吉亚诗歌，也有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果戈里、谢德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都是他爱看的俄罗斯作家。他读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作品的翻译本，萨克雷的《名利

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学方面的图书。在他阅读的书籍中值得说的有：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图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德列夫的《化学》等。对一个青年神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一个胆大的读书活动。如同熟悉祷文和圣经一样，他读过的东西从不会遗忘。多年以后，他经常引用和提到很多这样的书籍。

约瑟夫在神学院的头两年也写过诗。他从来没有提及过他的诗文，对这些诗的作者是谁既不承认也不否认。1893年下半年发表过五首诗，第二年发表了第六首。这些诗后来被人们遗忘了，一直到1939年12月，第比利斯的《东方曙光报》为了祝贺他的六十寿辰，在报上重新刊登了这些诗，通栏标题是“斯大林早年写的诗”。

这些诗带有浪漫色彩，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有一首诗是纪念格鲁吉亚著名诗人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的。他在诗中表现出强烈爱国热情。另一首引人特别注目的诗名叫《致月亮》，这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抒情诗，歌颂为反抗外国侵略者而牺牲的格鲁吉亚烈士们。如果这些诗果真都是约瑟夫写的，那就说明他当时是一位热情的格鲁吉亚爱国者。

埃米尔·路德维希在采访斯大林时过去提到，捷克政治家T·G·马扎里克说他认为自己六岁时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他接着问斯大林什么力量使他成为社会主义者，什么时候他成为社会主义者。斯大林答道：“我不能说我从六岁起就已经热爱社会主义了。或者说也不是从十岁或者十二岁。我参予革命运动是从十五岁开始的，当时我与当时居住在外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组织发生了联系。这些组织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对秘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发生了兴趣……而当时我读书的东正教神学院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了抗议学院实行的辱骂人的校规和耶稣教会的办法，我暗自下决心要成为而且真的已经成为革命者，成为真实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了。”

但是，约瑟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94年，而是在此后的两三年。严酷的校规当然使他产生了敌对情绪，然而他一贯憎恨别人对他发布命令。他不接受同学的敌对意见和批评，进而反唇相讥。伊雷马什维利认为他野心勃勃，对马克思主义并无兴趣，而对控制别人兴趣却很浓厚。

根据学院的记载，这位在头两年学习刻苦的优等生与修道士发生了冲突。1896年11月，助理学监穆拉霍夫斯基在学生品行登记簿上写道：

看来朱加施维里有一张从便宜出租书刊的图书馆借书的证件。今